

李鴻章與近代西方醫學在中國的傳佈

楊明哲*

摘 要

對於一個已經長期擁有自己醫學理論與技術的民族而言，當面對西方醫學時，人們在態度上的接受與抗拒，必然是個偌大的光譜。

在晚清的西方科技與西方文化移植過程中，李鴻章是人們無法迴避的重要人物，舉凡軍事、交通、教育、外交、經濟等各方面，都有他的一席之地。同樣的，在晚清時期西方醫學輸入中國的過程中，李鴻章也曾扮演重要的角色，本文希望還原李鴻章對西方醫學在近代中國傳佈的重要影響地位。

本文的寫作，一者根據較多李鴻章的相關史料，特別是新出版的《李鴻章全集》，提供許多探討李鴻章與近代西方醫學關係的一手資料；二者從更廣闊的視野，多方探討他對西方醫學的支持與提倡。李鴻章在個人與家人醫療上大膽選擇西方醫學，並且在醫學教育與軍醫需求上率先移植西方制度。影響所及，包括部分身邊的政治人物逐漸重視西醫，甚且清末各省先後提倡醫學教育及設立軍醫學堂。李鴻章對西方醫學的提倡與實踐的毅力，是近代西方醫學在中國的傳佈史上，鮮明的代表人物。

關鍵詞：李鴻章、西醫、軍醫、淮系

* 作者為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E-mail: mjyang@mail.cgu.edu.tw。

1. 前言

隨著中國近代醫學史研究的推進，近代西方醫學傳入中國的軌跡也日益清晰可見。從早期張星烺《歐化東漸史》一書，到近年的研究成果，均一致指出 19 世紀初是中國接觸近代西方醫學的開始。¹ 對於一個已經長期擁有自己醫學理論與技術的民族而言，當面對西方醫學時，人們在態度上的接受與抗拒，必然是個偌大的光譜。因此，有學者指出，「從疑慮、懼詫到認可、接納甚至崇拜，基本構成了晚清以來中國人對西洋醫學的認知軌迹」。² 然而，無論認知過程如何，早期率先引進西方醫學的領導人物們的勇氣與見識，都是值得欽佩與肯定的。

在晚清西方科技與文化移植的過程中，李鴻章(1823-1901)是人們無法忽視的重要人物，舉凡晚清的軍事、交通、教育、外交、經濟等方面的歷史，都有他的一席之地。晚清時期西方醫學輸入中國的過程中，李鴻章也曾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目前史學界探討李鴻章與近代西方醫學關係的研究成果，僅有李傳斌的〈李鴻章與近代西醫〉一文，³ 而且李文偏重李鴻章對西方醫學的看法，並且過於強調李鴻章重視西醫與軍事的關係，對於他在西方醫學的實踐與推廣較少著墨。本文的寫作，一來根據較多李鴻章相關史料的運用，特別是新出版的《李鴻章全集》，提供許多探討李鴻章與近代西方醫學關係的一手資料；二來從更廣闊的視野，多方探討他對西方醫學的支持與提倡，以還原李鴻章對西方醫學在近代中國傳佈的重要地位。

¹ 參見張星烺，《歐化東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頁 64-65。另見楊念群，〈西醫傳教士的雙重角色在中國本土的結構性緊張〉，《楊念群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1 月)，頁 363。

² 郝先中，〈晚清中國對西洋醫學的社會認同〉，《學術月刊》(上海，學術月刊社) (2005 年 5 月)，頁 73。

³ 李傳斌，〈李鴻章與近代西醫〉，《安徽史學》(合肥，安徽省社會科學院)，2001 年第 3 期，頁 24。

2. 李鴻章與西方醫學的接觸及實踐

(1) 李鴻章接觸西方醫學的開始

(a) 「上海經驗」與軍事征戰

1862 年 4 月(同治元年 3 月)李鴻章奉曾國藩(1811-1872)之命，率淮軍三千人由安慶乘輪進入上海，支援上海防衛任務。⁴「上海經驗」可說是李鴻章一生的重要轉捩點，因為他在上海親眼目睹諸多近代西方文明的成果，使得他的視野大開。⁵當時最吸引他興趣的，莫過於西方的「船堅砲利」，他是否此時便注意到西方軍艦上的軍醫存在，目前無法得知。但是，此一「上海經驗」，使得李鴻章得以睜眼看外面的世界，深切認知當時中外在許多科技上的差距；也由於這段「上海經驗」，李鴻章日後對西方科技保持高度濃厚興趣，是個標準的西方新科技的愛好者與支持者。⁶做為近代西方科技一環的西方醫學，它能否獲得李鴻章的青睞，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上海經驗」之外，李鴻章也在實際的軍事征戰中，進一步親身體驗包括近代西方醫學在內的西方科技文明。在李鴻章的洋幕僚中，有位出身英國軍醫的馬格里(Holiday Macartney)，他是李鴻章的第一個外國人幕友。1862 年(同治元年)馬格里辭去在英國軍隊中的職務，加入李鴻章的幕府。但是馬格里後來不是被李氏聘來從事醫療工作，卻是被聘去製造槍炮，以後他又被聘從事外交活動。⁷另外，有位叫老司的英籍人士，原為外籍兵團「常勝軍」醫生，1864 年 6 月加入淮軍後，轉行成為羅榮光(1834-1900)部洋炮隊教習。⁸從這兩位「不務正業」的洋醫師的遭遇來看，此時李鴻章對西方槍炮彈藥的

⁴ 雷祿慶編，《李鴻章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66 年 10 月初版)，頁 73。

⁵ 楊明哲，〈李鴻章對西方文化的認識〉，《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成立四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民國 92 年 7 月)，頁 176。

⁶ 張社生稱其為「科技迷」，見《絕版李鴻章》(上海，文匯出版社，2009 年 1 月)，頁 24。

⁷ (美) K. E. 福爾索姆著，*Friends, Guests, and Colleagues*，劉悅斌、劉蘭芝譯，《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 5 月)，頁 149。

⁸ 馬昌華主編，《淮系人物列傳——文職·北洋海軍·洋員》(合肥，黃山書社，1995 年 12 月)，頁 420。

興趣應是勝過西方醫學。

與李鴻章接觸西方醫學比較有直接關係的，與他征戰太平軍時兩位愛將的傷亡有關。先是 1864 年 3 月 25 日(2 月 18 日)清軍攻打浙江嘉興時，總兵程學啟(1829-1864)被打中「左太陽(穴)偏後，深六、七分，長一寸餘」，程學啟被急送至蘇州城就醫，李鴻章親往看視，「遣醫診治，據云創深入骨，血流過多，幸子已取出，尚可設法拯救」。⁹ 程學啟後因「自知傷重，不肯服藥」，李鴻章「再三慰勸，並延請內外科醫士進藥數劑」。¹⁰ 程學啟延至 4 月 15 日(3 月 10 日)仍然傷重身亡。¹¹ 由「子已取出」、「服寒涼峻劑」、「內外科醫士」數語，應有洋醫介入治療。稍後的常州之役，另一員猛將提督楊鼎勳(1852 從軍-1868)「被賊擡鎗子洞穿胸脇倒地」，「惟其受傷太重，死而復甦。臣為延西洋醫士調治，服峻劑年餘，創雖收口，胸中淤血積成痞塊，遂為錮疾」。¹²可確知聘有洋醫療傷。

經由程學啟、楊鼎勳兩人的不幸遭遇，李鴻章對西方醫學有進一步認識，這也是他開始接觸西方醫學的緣起。

(b) 傳教士馬根濟的影響

同治初年，李鴻章曾聘晚清第一個到外國學醫的黃寬(綽卿，廣東香山人，1829-1878)至其幕府工作，但黃寬不到半年就辭職。¹³ 黃寬可說是李鴻章正式接觸的第一位西醫，但有關兩人互動的資料闕如。1876 年(光緒 2 年)8 月中旬，李鴻章奉命到煙臺與英方代表談判馬嘉理事件。¹⁴ 到煙臺後，部分李鴻章的隨員染患瘡疾和痢疾，當時正在煙臺傳教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就將一些奎寧丸和止痛藥作為禮物送給李鴻章。李鴻章

⁹ 〈克復嘉興程學啟受傷片〉，(同治 3 年 2 月 20 日)，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年 1 月)，第 1 冊，《奏議》，卷 1，頁 454。

¹⁰ 〈為程學啟請卹摺〉，(同治 3 年 3 月 21 日)，《李鴻章全集》，第 1 冊，《奏議》，卷 1，頁 477。

¹¹ 同前註。

¹² 〈為楊鼎勳卹摺〉(同治 7 年 6 月 22 日)，《李鴻章全集》，第 3 冊，《奏議》，卷 3，頁 293。
楊鼎勳死於 1868 年 8 月 4 日(同治 7 年 6 月 16 日)。

¹³ 陳邦賢，《中國醫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 192-193。

¹⁴ 雷祿慶編，《李鴻章年譜》，頁 240-242。

發現這兩種藥具有特效，還致函表示謝意。¹⁵ 然而，畢竟是隨員生病，李鴻章對西醫的印象還不深。

真正讓李鴻章對西方醫學產生興趣的，是結識傳教士馬根濟(John Kenneth Mackenzie, 1850-1888)。兩人的互動，不但是兩人個別歷史上的重要事蹟，同時也是近代中國醫學史值得記錄的一頁。¹⁶ 馬根濟於 1875 年(光緒元年)由英國基督教倫敦傳道會派遣來到湖北漢口，1879 年 3 月中旬，教會又委派馬根濟到天津接任倫敦傳道會醫院院長。¹⁷ 馬根濟接手時，正是醫院經費短缺，無以為繼的困窘時期。於是馬根濟寫封中文信給當時的直隸總督李鴻章，希望得到李鴻章的支持。這封信在 1879 年 5 月中旬發出，但是直到 8 月 1 日才得到回音。李鴻章此時回應馬根濟的請求，是因為李鴻章的夫人病危，而天津的漢醫們已束手無策之際。¹⁸ 當天李鴻章派來差役，請馬根濟醫師和當時天津海關的醫官埃爾文(J. O'malley Irwin)到府為李夫人治病。出身傳教士的馬根濟認為李鴻章延請他去李府治病，是上帝「對我們的禱告的答覆」(Here was the answer to our prayers.)。¹⁹

¹⁵ William E. Soothill: *Timothy Richard of China* (London: Soeley, Service & Co. Limited, 1924)。(英)蘇慧廉著，關志遠、關志英、何玉譯，《李提摩太在中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 12 月)，頁 55。李提摩太 1870 年來華。

¹⁶ 承審查人指正馬根濟檔案收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SOAS)，本文寫作不及運用，另俟來時。

¹⁷ 魏外揚，《中國教會的使徒行傳：來華宣教士列傳》(臺北，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06 年 7 月)，頁 124。倫敦會醫院原係 1861 年 1 月(咸豐 11 年)英國在天津的駐屯軍建立的軍醫院，是天津第一個西醫機構，1868 年移交給英國基督教會，先改稱基督教倫敦施診所。見天津市地方志編修委員會編著，《天津通志》(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 年 9 月)，頁 340，另見羅芙芸(Ruth Rogaski)著，向磊譯，《衛生的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衛生與疾病的含義》(*Hygienic Modernity--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年 10 月)，頁 93。

¹⁸ 或謂李夫人之病為「難產」，見王秀雲，〈不就男醫：清末民初的傳道醫學中的性別身體政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59 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97 年 3 月)，頁 31。

¹⁹ Mrs. Bryson, *John Kenneth Mackenzie: 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 (London: 1891. reprinted by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San Francisco, 1977), pp.177-178。埃爾文或譯為艾溫、艾爾文、愛爾文、伊爾文。馬根濟在天津行醫經過，見劉祺，〈馬根濟與西醫在近代天津的傳播〉(1879-1888)，《歷史教學》，2008 年第 14 期。

經馬根濟和埃爾文幾次治療後，李夫人竟得好轉。李鴻章延請男性醫師且又是洋醫為李夫人治病一事，在當時女性不就男醫的社會習俗上，可說是不得不的大膽行為。²⁰ 但是為便於近身照料李夫人，馬根濟遂商請美國籍的美以美會女醫師郝維德(Miss Howard M. D.)直接進駐宅邸，一個月後李夫人得以完全康復。²¹ 《萬國公報》在次月曾報導此事，謂李鴻章透過美國駐天津副領事畢德格(Pethick William N.,? - 1902)代延西醫「麥良泉」、「安溫」，「不必望聞問切，祇用銀刀，就夫人臂上剔皮挖肉穴一小孔，灌以藥水，……三日後竟進飲食，現已霍然矣」。²² 與馬根濟的記錄有所出入，甚至稍嫌誇大，但李夫人病癒則一。

馬根濟和埃爾文為了加深李鴻章及身邊官員們對西醫的印象，同時也為掃除人們對西方醫學的疑慮和不信任，向李鴻章請求進行一次公開的外科手術演示。²³ 馬根濟一共進行三例手術，一例是切除病患頸部的腫瘤，一例是兔唇修復手術，又一例是惡性腫瘤切除手術。²⁴ 這次的外科手術演示顯然讓李鴻章留下深刻的印象，1899年(光緒25年)他寫信給李經方時，還提到「像小孩的頭一樣大」的頸瘤被切除一事，謂「余昔在津，親見愛(即埃爾文)、馬諸醫為人割頸瘤，奏刀如風」。²⁵ 對20年前的往事仍記憶猶新。

馬根濟治療李夫人等人一事，使他在天津一舉成名，不但成為李鴻章的家庭醫生，也成為許多達官貴人的醫療顧問。此事也在天津引起大轟動，對西方醫學在天津的推展有頗大的助益。天津的達官貴人問診者、請李鴻章介紹馬根濟者絡繹不絕，而市井小民像跛腳的、瞎眼的、耳聾的求治者更是門

²⁰ 王秀雲，前引文，頁30。

²¹ Mrs. Bryson, op. cit., pp.179-180。

²² 〈李爵相建立院醫〉，林樂知主編，《萬國公報》(臺北，華文書局影印，民國57年)，1879年9月13日(光緒5年7月27日)，頁37b(總頁6646)。畢德格1874年來華，後辭副領事職入李幕。

²³ 西方醫學經由公開的醫療活動取信於中國民眾的做法，為19世紀中國社會接受西方醫學的過程之一，見楊念群，《再造病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3月)，頁69-72。

²⁴ Mrs. Bryson, op. cit., p.182。

²⁵ 〈致李經方〉(光緒25年5月5日)，《李鴻章全集》，第36冊，《信函》，卷8，頁227。

庭若市。爲此，李鴻章先撥用衙門前的一間房間當馬根濟的施診所。但因問診者眾，空間不足，又撥用曾文正(國藩)公祠內一四合院爲義診場所。李鴻章將該診所命名爲「施醫處」(Free Hospital)，還捐贈施醫院銀 200 兩。²⁶「施醫處」大廳懸掛著李鴻章手書的楹對，其中一句是「有治人，有治法，不妨中外一家」。²⁷ 應能反映李鴻章此時兼容中外的醫學觀。《萬國公報》曾誌其盛，「近聞李爵相於天津新立一施醫院，延英國馬醫士司其院事，病者每日雲集，謝儀藥資分毫不取，一切皆爵相供給」。²⁸ 馬根濟還特別請郝維德醫師轉調到天津，專門負責女病患的看診工作。²⁹

因施醫院離馬根濟的教會過於遙遠，爲方便馬醫師看診，也爲容納更多求診者，當馬根濟向李鴻章建議擴大建造一棟永久性大醫院時，很快地獲得李鴻章首肯。李鴻章自己率先捐贈銀 4,000 兩(合 1,200 鎊)，這筆錢後來用來支付當地助手的薪水，購買外科設備、藥品及醫院其他開銷；至於醫院的硬體建設基金，到年底也募到 3,820 兩(合 1,146 鎊)。³⁰ 1880 年 12 月 2 日由李鴻章主持天津紫竹林新醫院開幕儀式，新醫院被稱爲天津總督醫院(Tien-tsin Viceroy's Hospital)，這是近代中國第一所完全由中土人士捐款興建的醫院，在近代中國醫學史上饒富意義。³¹ 《萬國公報》也曾報導新醫院開幕，中外人士冠蓋雲集的消息，並說李鴻章在開幕儀式後，「起觀各處藥房病室，並外科所用各種機器圖式」，《萬國公報》稱該醫院名爲「天津養病院」，因有

²⁶ Mrs. Bryson, op. cit., pp.182-183。「施醫處」的全名爲「閣爵督部堂施醫處」，見《申報》(上海，申報館)(上海：上海書店，1982-1987 影印再版)，1879 年 11 月 8 日(光緒 5 年 9 月 25 日)。

²⁷ 張維華，〈馬大夫紀念醫院簡史〉，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 38 輯(天津，天津市人民出版社，1987 年 1 月)，頁 150-151。

²⁸ 〈天津新立施醫院事〉，《萬國公報》，1879 年 10 月 25 日(光緒 5 年 9 月 11 日)，頁 92a(總頁 6757)。

²⁹ Mrs. Bryson, op. cit., pp.184-185。

³⁰ Mrs. Bryson, op. cit., pp.185, 187, 384。

³¹ Mrs. Bryson, op. cit., p.200。

病床可供住院療養。³² 1888 年(光緒 13 年)初,《申報》還推崇李鴻章協助蓋醫院之事,謂「津門之創設醫院,由李伯相爲之倡,於是西醫之名甚噪,而西藥亦復盛行」。³³ 可見總督醫院在西方醫學傳介的重要示範意義。

新醫院建好後,原有「施醫院」仍維持運作,馬根濟一星期有四天去看診,「施醫院」有編號的病患總共有 5,000 人以上。³⁴ 1886 年馬根濟所撰寫的工作報告顯示,該年醫院共進行 589 次手術,其中眼科手術 212 例,居首位。全年的住院人數爲 556 人,以眼科 164 人居第一位。每位病患的平均住院時間是 21.5 天。³⁵ 馬根濟在天津邊傳道邊行醫,每天的行程既忙碌又充實。³⁶ 1888 年 4 月 1 日復活節,馬根濟以 38 歲的英年逝世,天津總督醫院後由倫敦傳道會買回獨自經營。³⁷

(c) 外籍醫師的聘用

李鴻章的幕府被稱爲近代中國最大的幕府,³⁸ 除馬根濟外,李鴻章的幕府中曾先後聘用多名外國醫師,這些外國醫師或者擔任家庭醫師,或者擔任北洋海軍醫官,或者成爲醫學教育和醫療行政的監督人,同時他們也成爲他接觸西方醫學的重要連結。

有關李鴻章幕府中聘用的外籍醫師,列如下表:

³² 〈天津新養病院開院記〉,《萬國公報》,1881 年 1 月 1 日(光緒 6 年 12 月 2 日),頁 181a (總頁 7781-7782);《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 38 輯,頁 150。

³³ 〈論西藥漸行於中土〉,《申報》,1888 年 1 月 29 日(光緒 13 年 12 月 17 日)。

³⁴ Mrs. Bryson, op. cit., p.384。

³⁵ Mrs. Bryson, op. cit., pp.390-395。

³⁶ 馬根濟在天津的生活細節,參看 Harlan P. Beach, *Princely me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New York, Young People's Missionary Movement, 1907), pp.66-67.

³⁷ Knight Biggerstaff (畢乃德),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1) p.69。1924 年 1 月 18 日天津「英國基督教倫敦會醫院」新醫院大廈宣告落成,更名為「馬大夫紀念醫院」,見張維華,〈馬大夫紀念醫院簡史〉,頁 151-152。

³⁸ 歐陽躍峰,《人才薈萃:李鴻章幕府》,《近代名人幕府叢書》(長沙市,岳麓書社,2001 年 9 月),頁 53-54。據統計,李鴻章的幕府人數先後共有 566 人,遠超過曾國藩的 400 餘人。

表 1：李鴻章聘用外籍醫師一覽表

姓 名	國 別	工 作 性 質	資 料 來 源	備 註
鮑德均 (J. C. B. Bodkin)	英國	1881 年 5 月進中國海關，任天津醫員兼四等幫辦、北洋海軍醫官。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編，陳霞飛主編，《中國海關密檔》，《赫德、金登幹函電匯編》(1874-1907)，第 2 卷(1878-1881)(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6 月)，頁 674-675。	1888 年回國休假，死於途中。
歐班 久瓦民	法國 法國	二人 1881 年主辦「醫學館」。	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津簡史》編寫組，《天津簡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 年 8 月)，頁 165。	
阿布德	美國	於北洋醫學館襄助馬根濟執教。	馬昌華主編，《淮系人物列傳——文職·北洋海軍·洋員》，頁 433。	
埃爾文 (J. O'malley Irwin)	英國	天津海關醫官，1881 被聘為家庭醫師，1888 年被聘為北洋海軍醫官，1896 年任李鴻章出訪歐美隨從醫生。	同上	
郝爾德	英國	施醫處官醫生，隨馬根濟在北洋行醫。	同上	
潘金(H. M. Perkins)	美國	1889 年 4 月 27 日聘為牙醫。	寶宗一編，《李鴻章年(日)譜》，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七十輯》，臺北，文海出版社，頁 4980。	
歐士敦 (Andrew Irwin)	英國	原任天津稅務署醫官，後任天津總醫院、北洋西醫學堂顧問。	《醫院創立學堂摺》(光緒 20 年 5 月 23 日)，《李鴻章全集》，第 15 冊，《奏議》，卷 15，頁 365。	
慈巴茨司 (慈巴茨斯)	法國	1895 年李鴻章聘其為赴日議和之隨從醫生。	馬昌華主編，《淮系人物列傳——文職·北洋海軍·洋員》，頁 433。	

姓 名	國 別	工 作 性 質	資 料 來 源	備 註
克爾克	英國	北洋海軍醫官	同上	
道禮思	法國	北洋海軍醫官	歐陽躍峰,《人才薈萃:李鴻章幕府》,頁 49。	
滿樂道 (Robert Coltman, Jr. 1862-1931)	美國	李鴻章私人醫師	馬伯英等著,《中外醫學文化交流史——中外醫學跨文化傳通》(上海,文匯出版社,1993 年),頁 362。	

根據上表,李鴻章所延聘的外籍醫師包括英、法、美三國國籍,英、法籍較多,這些外籍醫師的來源反映這些國家在中國的強勢地位,既說明這些國家在中國的傳教力量較大,也說明這些國家在近代醫學的領導地位。³⁹這些外籍醫師不但是李鴻章個人與家族的醫療照護人員,同時也是西方醫學技術、醫學教育與醫學制度輸入晚清中國的重要橋樑。

(2) 李鴻章對西方醫學的實踐

(a) 個人醫療與養生

在晚清時期的名人中,李鴻章對西方事物的好奇與實踐應該無人可及,後來的人們稱他「愛沾洋氣」。⁴⁰當大多數人們仍把洋人、洋文視為「毒蛇猛獸」的年代,李鴻章不但提倡公領域西方語文人才的培養,並且鼓勵自己的子姪輩們前往上海廣方言館學習外文,甚至延聘洋人到家中當孩子的外文家教老師。⁴¹為此,李鴻章在個人的醫療行為上,頗傾向西方醫療方式也就不足為奇。

1887 年 11 月(光緒 13 年 9 月)李鴻章病舌,治癒後,他曾去信後來成為他女婿的張佩綸(1848-1903)謂,「九月間,舌本偶有腫處,服洋醫藥已痊癒,

³⁹ 關於帝國主義與近代西方醫學散佈擴張,參見李尚仁,〈醫學、帝國主義與現代性:專題導言〉,《臺灣社會研究季刊》(臺北: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社),第 54 期,2004 年 6 月,頁 4。

⁴⁰ 張社生,《絕版李鴻章》,頁 30。

⁴¹ 楊明哲,〈李鴻章對西方文化的認識〉,頁 215-216。

華醫謂心脾之熱，西醫云由破齒鋸牙嚙損，迨拔去殘牙即無患。」⁴² 這位洋醫即香港西醫書院的首任教務長萬森博士(Dr. Patrick Manson, 1844-1922，或譯孟生、萬巴德、馬參)，他專程由香港北上為李鴻章診治。⁴³

李鴻章的大病劫是隔年 1888 年(光緒 14 年，65 歲)的遭遇，是年春他感受風寒，他給張翼(1846-1913)的信函中稱：「日夜苦咳，痰極膠膩，竟夕不眠，強食則吐。初用中醫數劑，不見功效，乃一意改用洋醫，日來宿痰漸清，咳嗽亦止，飲食較進，治事如常，特未能冠服出廳事見賓客耳。據洋醫云，積寒頗深，宿疾須加盪滌，經此發洩攻治之後，痼疾轉可拔除。向來略感風寒，鼻即窒塞，兼流清涕，信其言不誣也。」⁴⁴ 到秋季，更嚴重的病難踵至，《李文忠公鴻章年譜》謂其「9 月出巡諸海口，歸患目疾，請假二月餘」。⁴⁵ 簡短數語，實際的痛苦非外人能體會。是年 11 月 14 日(光緒 14 年 10 月 11 日)他寫信給哥哥李瀚章(1821-1899，晚號鈍叟)便說：「目蒙未減，左頰筋猶未舒，洋醫謂，須逐漸調治，望後擬附片請假廿日。」⁴⁶ 三日後，他向朝廷請假 20 天，敘述自己病情，「左目昏蒙發赤，視物模糊，左腮上下筋脈抽搐，口角向右牽曳歪邪，胃納減少，精神疲憊，診治多日，尚未就痊。醫者謂由年衰血弱，外邪易入，必須避風靜養，始可漸愈。」⁴⁷ 可是次月假滿，病情仍未改善，他又得續假，病狀大同小異，他懇請能再賞假一月，「俾得靜心調理，逐漸就痊」。⁴⁸ 後來病況改善頗多，1889 年 2 月 6 日(光緒 15 年正月 7

⁴² 〈致張佩綸〉(光緒 13 年 10 月 23 日)，《李鴻章全集》，第 34 冊，《信函》，卷 6，頁 287。

⁴³ 張禮恒，《何啟、胡禮垣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12 月)，頁 86。萬森博士在華 22 年，參見同書，頁 39。萬森博士 1868 年至 1871 年曾主持旗後醫館，見蘇芳玉，〈清末洋人在臺醫療史——以長老教會、海關為中心〉(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1 年 6 月)，頁 43-44。

⁴⁴ 〈致江蘇候補道張翼(燕謀)函〉(光緒 14 年 5 月 4 日)，《李鴻章全集》，第 34 冊，《信函》，卷 6，頁 370。張翼時任開平礦務局督辦。

⁴⁵ 李書春，《李文忠公鴻章年譜》(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 70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9)，頁 4728。

⁴⁶ 〈致李瀚章函〉(光緒 14 年 10 月 11 日)，《李鴻章全集》，第 34 冊，《信函》，卷 6，頁 441。

⁴⁷ 〈請病假片〉(光緒 14 年 10 月 14 日)，《李鴻章全集》，第 12 冊，《奏議》，卷 12，頁 489。

⁴⁸ 〈再請病假片〉(光緒 14 年 11 月 5 日)，《李鴻章全集》，第 12 冊，《奏議》，卷 12，頁 505-506。

日)他去信李瀚章，頗自信地說：「鄙恙至臘杪已愈九分，恰如伊爾文所云，不見口角歪邪之迹，開春則日減一日，左目浮腫全愈，左頰筋絡活動，只口唇上稍有拘滯，大約六禮拜準可復元矣。」⁴⁹ 同年春天，王闓運由湖南到天津來看他，「坐久之，李相始出，云用電氣熨面，並服補筋藥，今將復元，唯言語稍喫力」。⁵⁰ 可見已有進展。至夏天，他給兒子李經方(1855-1934)的家書提到，「余面筋復元，惟左目漸蒙」。顯然視力恢復仍欠佳。⁵¹

1894 年(光緒 20 年)8 月，他在天津會見國際禁煙聯盟執行祕書，《紐約時報》曾報導相關新聞，並說：「李在兩三年前得過一次麻痺症，開始曾擔心會造成嚴重後果，但經過歐洲醫生或曾在歐洲接受教育的中國醫生診治後，恢復得非常順利，以至於他現在看不出有什麼明顯的虛弱跡象。」⁵² 報導所指的李鴻章患「麻痺症」一事，究竟是 1888 年的後遺症，或是新患，目前未知。但是可以瞭解他對西方醫學依賴頗深，在西醫的詳細照料、治療下，雖已 72 高齡，仍予人健康印象。

1895 年(光緒 21 年)李鴻章銜命到日本談判《馬關條約》，隨從醫生有法國駐華使館的慈巴茨斯醫師及四品銜直隸候補同知林聯輝(1862-1900)兩人。⁵³ 談判期間，李鴻章曾遭日本浪人開槍襲擊，左頰中彈。經隨從洋醫及日本天皇御醫治療並檢查，因顧慮李鴻章年高，彈頭未予取出。⁵⁴ 他電告總理衙門，「鴻受傷時昏暈輿中，血滿襟袍，元氣大傷，幸部位恰當，頰骨若上下半寸，必即致命，實仰托聖主洪福，諸醫診視再四，子嵌骨縫，礙難取

⁴⁹ 〈致李瀚章〉(光緒 15 年正月 7 日)，《李鴻章全集》，第 34 冊，《信函》，卷 6，頁 488。

⁵⁰ 王闓運，《湘綺樓日記》(光緒 15 年 3 月 6 日)(臺灣學生書局，民 74 年 2 月)，頁 13a(總頁 465)。

⁵¹ 〈致方兒〉(光緒 15 年 8 月 22 日)，《李鴻章全集》，第 34 冊，《信函》，卷 6，頁 602。

⁵² 鄭曦原編，《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上冊(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3 年 2 月 1 日)，頁 196-197。

⁵³ 馬昌華主編，《淮系人物列傳——文職·北洋海軍·洋員》，頁 433；〈附赴日隨帶各員銜名清單〉，《李鴻章全集》，第 16 冊，《奏議》，卷 16，頁 32。

⁵⁴ 參見苑書義，《李鴻章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 3 月)，頁 403。

出，皮肉醫痊，約須月餘」。⁵⁵ 在回覆朝廷的慰問的電報中，他說明病情，謂「據洋醫稱，子入二寸餘，深嵌骨縫，非割開兩邊皮肉，不能挖取，高年恐難禁此大痛，日兩藥水洗治皮肉，可望補復。」⁵⁶ 可見此時他的醫療大抵由西醫照料。

1896 年(光緒 22 年)李鴻章奉命出訪俄國並遊歷歐美，他的隨行醫師為「蘇格蘭醫生艾溫(即埃爾文)博士和改成洋名的清國醫生喬治·馬克博士(原名梅盛清 Mai Shen Chin)」。⁵⁷ 梅盛清即華籍西醫麥信堅(18635-1947)。⁵⁸ 西方報紙對李鴻章身旁的華籍西醫似乎頗有好感，謂「曾為總督當過四年醫生的喬治博士，從天津醫學堂畢業，英語異常流利、準確，博士不相信巫術能治病，他學識淵博、醫術超群。」⁵⁹ 此行李鴻章到德國柏林時，曾接受德人用 X 光(時謂朗德根之術、照骨術)檢查受槍擊之傷處，「即見槍子一顆，存於左目之下，纖毫畢現」。⁶⁰ 李鴻章可說是晚清中國最早一批接受 X 光檢查的對象。⁶¹

1901 年(光緒 27 年)義和團事件後，李鴻章奉旨由廣州到北京談判《辛丑和約》，這時他已高齡 79 歲。李鴻章力疾從公，與列強代表往復商議，並於 9 月 7 日(7 月 25 日)簽完和約，此時他體弱多病，已是油盡燈枯。他向在西安的朝廷報告病情，謂「臣於十九夜丑刻陡咯血半盂，色紫黑，有大塊，虛汗，頭眩，勢甚危急，當延洋醫服止血藥，兩日以來，幸未再吐。現仍不

⁵⁵ 〈寄譯署〉(光緒 21 年 2 月 29 日酉刻)，《李鴻章全集》，第 26 冊，《電報》，卷 6，頁 83。

⁵⁶ 〈寄譯署〉(光緒 21 年 3 月 1 日)，《李鴻章全集》，第 14 冊，《奏議》，卷 14，頁 84-85。

⁵⁷ 鄭曦原編，《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下冊，頁 471、489。

⁵⁸ 李經述，〈隨使歐美洲記〉，《李襲侯遺集》，卷 5，李國杰編，《合肥李氏三世遺集》，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7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頁 29a(總頁 1225)。麥信堅，廣東番禺人，「總督醫院附屬醫學館」畢，1888 年任北洋醫局醫官，時為候補縣丞銜。

⁵⁹ 鄭曦原編，《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下冊，頁 486-487。

⁶⁰ 蔡爾康、林樂知編譯，張英宇點，張玄浩校，《李鴻章歷聘歐美記》(原名《李傅相歷聘歐美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 6 月)，頁 72。

⁶¹ 傅維康，〈李鴻章拍「X 光」〉，《醫藥文化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12 月)，頁 320。鄧紹根，〈中國第一臺 X 光診斷機的引進〉，《中華醫史雜誌》(北京，中華醫學會)，第 32 卷第 2 期(2002 年 4 月)，頁 99-100。

能起坐，坐即頭暈，醫云胃家小血管掙破，非靜臥安養，寬以時日，但喫牛奶、雞湯、藕粉、稀粥，禁食乾硬之物，破管不能復合」。⁶² 朝廷體恤他「爲國宣勞，憂勤致疾」，「賞假十日，安心調理，以期早日就痊」。⁶³ 這恩賜的十天病假，他無法享用，因爲接到電諭的次日李鴻章便逝世。時人曾記李鴻章致死之因，謂「西醫屬其不必多食，不聽，屬其不必食某物，亦不聽。又屬其萬不可食糯米物，本日即飽食，次日仍自告西醫。」而「西醫因屢進忠言不聽，直告之曰：『中堂再如是亂吃，必須死矣。』文忠不聽而去語人曰：『西醫之言何戇也。』又逾七日，西醫已謂萬不能治」，⁶⁴ 似乎此時的李鴻章不是合作的病人。

除個人醫療多次應用西醫外，李鴻章在日常生活與養身方面也頗好西式作風。梁啟超謂李鴻章：「起居飲食皆立一定時刻，甚有西人之風。」、「養生一用西醫法，每膳供雙雞之精汁，朝朝經侍醫診驗，常上電氣」。⁶⁵ 吳汝綸的個人信件透露李鴻章和恭親王、醇親王三人皆視牛肉精爲「養老扶衰」的至寶。⁶⁶ 劉聲木筆下也提到李鴻章「晚年頤養之品，只日服牛肉汁、蒲(葡)萄酒二項，然皆經西醫考驗，爲泰西某某名廠所製成，終身服之，從不更易。牛肉汁須以溫水沖服，熱則無效，葡萄酒於每飯後服一杯，以助消化。」⁶⁷ 他喜歡小飲葡萄酒一事，在 1896 年 8 月 29 日的《紐約時報》得到證實，當日

⁶² 〈寄洛陽行在軍機處〉(光緒 27 年 9 月 22 日巳刻)，《李鴻章全集》，第 28 冊，《電報》，卷 8，頁 453。

⁶³ 〈行在來電〉(光緒 27 年 9 月 26 日亥刻到)，《李鴻章全集》，第 28 冊，《電報》，卷 8，頁 455。

⁶⁴ (清)劉聲木撰，〈李鴻章致死之由〉，《萇楚齋三筆》，卷 4，見氏著，《萇楚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下)，(清代史料筆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8 月第 1 版第 2 刷)，頁 551。劉聲木爲劉秉璋(安徽廬江，1828-1906，官至四川總督)子。

⁶⁵ 梁啟超，《論李鴻章》(臺北市，中華書局，民國 47 年 6 月)，頁 84。

⁶⁶ 〈與王西渠〉(癸巳(1893 年)2 月 23 日)，徐壽凱、施培毅校點，《吳汝綸尺牘》(合肥，黃山書社，1990 年 2 月)，頁 47。牛肉汁似爲當時風行的健康食品，《上海洋場竹枝詞》內有〈牛肉汁〉一首，「肥牛蒸肉製成漿，小巧洋瓶取汁藏。蛋白質多推妙品，功能補胃潤枯腸。」參見顧炳權編著，《上海洋場竹枝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 年 12 月)，頁 161。

⁶⁷ (清)劉聲木撰，〈記老年頤養各事〉，《萇楚齋五筆》，卷 2，《萇楚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下)，頁 931。

的報紙就三次講到他喜歡小酌，並詢其隨從，知其喜在飯後飲一點葡萄酒，是法國產的紅葡萄酒。⁶⁸

歐美之行使李鴻章成為各國媒體焦點，廠商也順勢利用他的高知名度與高曝光率，拿他當商品廣告代言人。在美國時，有家麥精公司利用李鴻章的照片和簽名當報紙平面廣告。廣告上李鴻章說：「我是 JOHANN HOFF 公司麥精的長期用戶，吃了麥精後身體特棒、精神特好。」⁶⁹ 此時，他已成為近代中國第一個保健商品代言人。⁷⁰ 此時，他也利用對美國教會人士演講的機會，向教會在華開辦學校與醫院表示感謝，謂「貴教會多設醫院於我華，以施醫給藥諸功德，濟行醫賣藥之窮。」⁷¹ 對美國教會善行予以肯定。

這些有關李鴻章的醫療情況與健康養生的訊息，充分說明西方醫學在他心中的份量。

(b) 家人醫療與保健

李鴻章除前述請馬根濟治療其夫人外，對其他家人的照顧與醫療也頗重用西醫。1889 年(光緒 15 年)李鴻章的次子李經述(1864-1902)染病，他去信大哥李瀚章時提及此事，謂：「述兒六月初病夾脾傷寒，幾瀕於危，展(輟)轉牀褥廿餘日，先服伊爾文金雞臘丸退熱，嗣延華醫調理，近數日方食粥飯，諸症皆瘥，仍日服洋醫開胃順氣補血藥水，可冀復元。」可見他並未完全排斥漢醫。⁷² 1891 年(光緒 17 年)李鴻章去信李經方，安慰「去冬所生之孫殤逝」外，也告訴他：「六孀病似未愈，何不勸就滬上女洋醫診治。華醫於婦科多隔膜耳。」⁷³ 兩個月後，李鴻章再度去信李經方，言其孀母「病久不癒，

⁶⁸ 張社生，《絕版李鴻章》，頁 23。

⁶⁹ 同前註，頁 24。

⁷⁰ 同前註，頁 23。

⁷¹ 《李鴻章歷聘歐美記》，頁 206。

⁷² 〈致李瀚章〉(光緒 15 年 7 月 12 日酉刻)，《李鴻章全集》，第 34 冊，《信函》，卷 6，頁 583。

⁷³ 〈致李經方〉(光緒 17 年 3 月 6 日夜)，《李鴻章全集》，第 35 冊，《信函》，卷 7，頁 191。1862 李經方以六弟李昭慶(1835-1873)子過繼鴻章，六孀指李昭慶妻郭氏(1834-1891)，即李經方生母。

又不肯赴滬就洋醫，恐難就癒」。⁷⁴

1892年2月3日(光緒18年正月初五日)李鴻章風光的過完七十大壽後，隔日，15歲么兒李經進以疫疾。⁷⁵ 翁同龢(1830-1904)在正月13日日記云，「聞合肥相國之幼子(頌閣之婿，今年十五，極聰慧)於初六病卒，三日病耳。……相國篤信洋醫，此亦為其所誤」。⁷⁶ 同年7月3日(6月初10日)李鴻章繼配趙氏卒，他後來寫信給李經方，告以「汝母自去年冬至病後，體氣大虧，咳逆脹痛時作。夏至前偶感暑風，服華醫藥不效，六月初改服伊、郝兩洋醫藥，而內燒日劇一日，無法減退，……竟於初十巳正長逝。」⁷⁷ 雖然接連遭遇喪子、喪妻之痛，但無改李鴻章對西方醫學的支持態度。

1897年(光緒23年)李鴻章寫信給女婿張佩綸，指導種牛痘、照西法餵乳等西式育兒法，並謂「絕無流弊」。信中並言及自己近況，謂起居飲食如常，「往年飯後千步，今則百餘步即氣喘腿軟」。⁷⁸ 近四個月後，張佩綸的幼嬰夭折，他再去信安慰。⁷⁹ 1899年(光緒25年)李鴻章去信李經方，提到孫子李國杰(李經述長子)，「去冬有疾，服洋醫調理，已將復元」。⁸⁰ 同時期，李經方曾聘請蕪湖醫院醫師開刀切除頸部腫瘤，李鴻章安慰他：「頸核竟如鵝卵，割去甚好，氣血已傷，必須如期靜養，永除後患。」⁸¹ 同年的其他信件，提到「前電告知洋醫藥費由我出，赫君雖未大效，然來往奔馳，如何酬勞」，⁸² 「洋醫藥費用英洋千五百元」，⁸³ 細節未詳，可能與李經方聘請赫懷

⁷⁴ 〈致李經方〉(光緒17年5月12日)，《李鴻章全集》，第35冊，《信函》，卷7，頁207。郭氏應在此信之後卒。

⁷⁵ 雷祿慶，《李鴻章年譜》，頁432-434。

⁷⁶ 陳義傑整理，《翁同龢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6月)，第5冊，頁500，光緒18年壬辰(1892年)正月13日。頌閣指徐郙(1838-1903在世)。

⁷⁷ 〈致李經方〉(光緒18年7月6日)，《李鴻章全集》，第35冊，《信函》，卷7，頁401-402。

⁷⁸ 〈致張佩綸〉(光緒23年2月22日)，《李鴻章全集》，第36冊，《信函》，卷8，頁138。

⁷⁹ 〈致李經方〉(光緒23年6月15日)，《李鴻章全集》，第36冊，《信函》，卷8，頁152。

⁸⁰ 〈致李經方〉(光緒25年3月11日)，《李鴻章全集》，第36冊，《信函》，卷8，頁220。

⁸¹ 〈致李經方〉(光緒25年5月5日)，《李鴻章全集》，第36冊，《信函》，卷8，頁227。

⁸² 〈致李經方〉(光緒25年8月20日)，《李鴻章全集》，第36冊，《信函》，卷8，頁236。

⁸³ 〈致李經方〉(光緒25年9月17日)，《李鴻章全集》，第36冊，《信函》，卷8，頁244。

仁醫生(W. E. Hart)治療有關。⁸⁴

即便遭遇家人病故、幼孫早殤，李鴻章對西方醫學仍有一貫的信持奉行態度，用西醫之法從事養育、醫療，儼然已成為李鴻章家族的生存法則一般。

(c) 合肥施醫局的設立

1899年(光緒25年)夏，李鴻章77歲，長他兩歲的大哥李瀚章病逝合肥。⁸⁵從1899年至1901年李鴻章給李經方的信函中，可以看到他持續地叮嚀、督促李經方推動合肥施醫局的籌建工作。在1899年11月李鴻章寫給李經方的信裡，他以父兄受害劣醫為由，提出辦西洋施醫局的心願，他寫道：「每念吾鄉無好醫，先光祿公暑症為庸醫送命，鈍老頸疽外症又為馬醫所誤，吾家實受其害，若於郡城捐辦西洋施醫局，救人功德不小。爾於此事稍有閱歷，就近察看滬、蕪各醫院規模，採取章程，設法仿辦。約計需款若干，我當設法籌畫，並勸各房量力資助。……天津學堂醫學生明年可供調用。此吾心願，望實力贊成之。」⁸⁶次月，李鴻章再去信提此事，「施醫局可大可小，月籌千餘金，尚可勉力，俟到滬後再議」。⁸⁷隔年5月，施醫局似已建成，他進一步詢問醫師安排與薪酬情形，他在信中說：「合肥醫院大致就緒。劉生赴郡選賃何屋？我家市房有合用者否？北洋生先要百元一月，劉年千元，屆時或稍加，由汝酌辦。所需四千金，七月當可匯支。」⁸⁸四千兩應為施醫局開辦經費。對於醫師人選問題，他認為「(施醫局)開辦之始，就醫人氏無多，劉醫或可勾當」，此時對任用北洋學生，他反而認為「既思厚俸，又欲保官，已成錮習，非不得已，可勿調用」。⁸⁹

⁸⁴ 1888年美國基督教美以美會派遣傳教士赫懷仁醫生到蕪湖傳教，後並創辦「蕪湖醫院」，此為傳教士在安徽開設的第一家教會醫院。見安徽文化史編委會，《安徽文化史》，下冊(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2285。

⁸⁵ 雷祿慶，《李鴻章年譜》，頁608。

⁸⁶ 〈致李經方〉(光緒25年10月初6日)，《李鴻章全集》，第36冊，《信函》，卷8，頁247。此施醫局未知其名，姑稱為「合肥施醫局」；又，天津學堂係指北洋西醫學堂。

⁸⁷ 〈致李經方〉(光緒25年11月12日)，《李鴻章全集》，第36冊，《信函》，卷8，頁249。

⁸⁸ 〈致李經方〉(光緒26年4月19日)，《李鴻章全集》，第36冊，《信函》，卷8，頁259。

⁸⁹ 〈致李經方〉(光緒26年5月13日)，《李鴻章全集》，第36冊，《信函》，卷8，頁260。劉

1901 年 2 月正是李鴻章赴京談判《辛丑和約》之時，他仍掛念老家施醫局的情況，他去信詢李經方「廬州醫院近日辦理若何，汝尚抽暇回蕪否？」⁹⁰ 次月，在信中又叮嚀李經方，「醫院初創，大費經營，所定條規，似均妥密，照此實力行之，必能有裨桑梓」。⁹¹ 合肥鄉民對施醫局的反應頗熱烈，「廬郡醫局開辦，來診竟數百人」，李鴻章有些意外，他去信李經方，謂「恐醫手、藥料不敷，尚需隨時察酌加增，勿惜小費」。⁹² 在 6 月 15 日給李經方的信中，李鴻章表露對施醫局的欣慰之情，「合肥施醫就診日眾，使鄙人得施惠於鄉里窮人，於心稍慰」。⁹³

李鴻章籌設合肥施醫局一事，未見其他相關資料佐證，由李氏父子前後數函往來判斷，應可確信其為真。⁹⁴

(d) 對西方醫學的支持

贊助馬根濟設立醫院外，李鴻章對其他有關西方醫學的贊助與支持也不乏例子。例如在 1881 年 10 月 18 日，李鴻章夫婦二人參觀郝維德醫生設在天津的醫院，李鴻章大受感動，於是將此醫院一些情況奏明朝廷，「御下旨頒獎，並賜下匾額一方」，此後李鴻章還給該醫院捐助款項。⁹⁵

1887 年 10 月 1 日香港第一所大學專科學校－香港西醫書院(The Hong

醫應即前信「劉生」。

⁹⁰ 〈致李經方〉(光緒 26 年 12 月 15 日)，《李鴻章全集》，第 36 冊，《信函》，卷 8，頁 264。

⁹¹ 〈致李經方〉(光緒 27 年正月 22 日)，《李鴻章全集》，第 36 冊，《信函》，卷 8，頁 267。

⁹² 〈致李經方〉(光緒 27 年 2 月 14 日)，《李鴻章全集》，第 36 冊，《信函》，卷 8，頁 268。

⁹³ 〈致李經方〉(光緒 27 年 4 月 29 日)，《李鴻章全集》，第 36 冊，《信函》，卷 8，頁 270。

⁹⁴ 經查《合肥市志》等資料，均未提及有合肥施醫局。合肥最早的醫院應為 1894 年(光緒 20 年)，德國人戴爾第至合肥傳教，在德勝門天主教堂設置的「聖心診所」。1908 年(光緒 34 年)胡一吾在合肥開辦惠民醫院，設病床 48 張，有醫士 3 名，護士 8 名，此為中國人在合肥開辦最早的西醫醫院。參見陳毅華，〈基督教在合肥〉，合肥文史資料編輯部編，《合肥文史資料》(安徽大學，1991 年 10 月)，第 7 輯，頁 184；合肥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合肥市志》，《安徽省地方志叢書》(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 年 9 月)，冊 1，頁 16，〈大事記〉及冊 4，頁 2999。

⁹⁵ 羅運炎編，《衛理公會年議會簡史》(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1947 年)，頁 42。轉引自李傳斌，〈李鴻章與近代西醫〉，頁 23。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成立，為五年制醫學院。⁹⁶ 1888 年香港西醫書院徵求李鴻章為名譽贊助人，1889 年李鴻章覆函表示同意，並在信中強調化學在醫學教育上的重要。⁹⁷

又如 1890 年時，李鴻章替美國傳教士醫生洪士提反(S. A. Hunter)所翻譯的《萬國藥方》一書作序，言「是書專明用藥方劑，亦如葛洪《肘後》、思邈《千金》之體，以便循省。倘學者合中西之說而會其通，以造于至精極微之境，於醫學豈曰小補？則君嚆矢之功，其壽世壽人，詎可量哉歟。」⁹⁸

1894 年(光緒 20 年 7 月)天津法租界成立女醫院，李鴻章曾資助一萬元，醫院正式名稱「爵閣督部堂女醫院」，後來還陸續有所捐助。此醫院後由英國女醫師負責，專門收容診療中土婦女病患。⁹⁹

另外，當李鴻章擔任兩廣總督時，在中國推動「天足會」的立德夫人(阿綺波德·立德, Alicia Little, 1845-1926)曾透過李經方的安排去拜訪李鴻章，立德夫人在她的書中提到李鴻章贊助富爾頓大夫的醫院 100 塊大洋的事。¹⁰⁰

李鴻章在個人與家人醫療上大膽選擇西方醫學，也多方贊助與西方醫學相關的事務，甚至在垂暮之年關切安徽故里的醫療建設，他對西方醫學的提倡與實踐的毅力，在近代中國醫學史上是個鮮明的代表人物。

⁹⁶ 余繩武、劉存寬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 8 月)，頁 313。

⁹⁷ 1889 年德臣西報(China Mail)剪報，轉引自羅香林，《國父之大學時代》(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 43 年)，頁 10-11。

⁹⁸ 〈敬錄李少荃伯相萬國藥方序〉，《萬國公報》(1890 年 12 月)，頁 13a(總頁 11653)。

⁹⁹ 山口昇，《歐米人の支那に於ける文化事業》(上海，日本堂書店，大正 11 年 1 月 15 日)，頁 1238。

¹⁰⁰ 阿綺波德·立德著，王成東、劉浩譯，《穿著藍色長袍的國度》(*The Land of Blue Gown*) (北京，時事出版社，1998 年 1 月)，頁 308。富爾頓大夫應為 Albert A. Fulton (1849-1935)，美國傳教士，1880 年來華，在廣州傳教。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年 6 月)，頁 156。

3. 李鴻章與近代西方醫學制度的移植

個人與家人的醫療保健偏重西醫外，李鴻章更進一步移植西方醫學教育與西方軍醫制度，他的努力使晚清中國與西方醫學逐漸接軌。以下分從成立總督醫院附屬醫學館、創設北洋西醫學堂、引進北洋海軍軍醫制度等三方面加以敘述。

(1) 成立總督醫院附屬醫學館

1881年12月(光緒7年10月)馬根濟和李鴻章的美國籍秘書、翻譯兼顧問畢德格聯合上書李鴻章，建議成立北洋醫學館，挑選聰穎少年子弟隨同學醫，以備考取醫官，分赴軍營、戰艦充當官醫，並擬訂醫學館章程十一條，¹⁰¹這個建議獲得李鴻章採行。這所「北洋醫學館」當時稱為「醫藥館」，¹⁰²也就是英文所稱的「總督醫院附屬醫學館」(Viceroy's Hospital Medical School)。為免和後來的「北洋醫學堂」一詞混淆，所以本文以「總督醫院附屬醫學館」稱之。¹⁰³

此時，正逢清廷選派幼童赴美留學政策變化，決定召回在美留學幼童。¹⁰⁴1881年(光緒7年)清廷將94名幼童分作三批返國，其中21名送電報局學傳電報，船政局、上海機器局留用23名，其餘50名分撥天津水師、機器、魚雷、水雷、電報、醫館等處學習當差。¹⁰⁵撥醫館的學生，係由馬根濟建請李鴻章從中間考選8個學生，成為總督醫院附屬醫學館的第一屆學生。1881

¹⁰¹ 馬昌華主編，《淮系人物列傳——文職·北洋海軍·洋員》，頁407。

¹⁰² Knight Biggerstaff, op. cit., p.68。

¹⁰³ 翟立鶴一書亦用此名，見氏著《清末教育西潮——中國教育現代化之萌芽》(臺北，國立編譯館，2002年10月)，頁488。

¹⁰⁴ 幼童赴美留學及其政策變化事，見舒新城，《近代中國留學史》(上海，中華書局，民國22年2月)，頁10-13。另見石霓著，《觀念與悲劇——晚清留美幼童命運剖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頁160-161。

¹⁰⁵ 〈肄習西學請獎摺〉(光緒11年3月3日)，《李鴻章全集》，第11冊，《奏議》卷11，頁54。赴美幼童原共120名，其中因事故撤回及在洋病故者共26名。

年 12 月 15 日附屬醫學館正式開學，這是近代中國第二所教授西醫的醫學學校。¹⁰⁶ 附屬醫學館學制為 3 年，由馬根濟和英美駐天津的海軍外科醫生共同擔任教學，法籍人士歐班和久瓦民也參與其事，但細節未詳。¹⁰⁷ 1885 年第一屆學生畢業，學生原有 8 人，但畢業時剩下林聯輝、金大廷(1862-1900 陣亡)、李汝淦、何廷梁、曹茂祥、周傳謬 6 人。¹⁰⁸ 第一屆畢業生都受到李鴻章的保舉，分別賞給九品銜。其中第一名林聯輝因成績優秀被留校任教，李鴻章還請朝廷為其加六品銜。為感謝馬根濟對醫學教育的貢獻，李鴻章同時奏請朝廷獎賞馬根濟「三等第三寶星」勳章。¹⁰⁹ 第二屆 4 名學生，均為香港師範學校畢業生，1883 年入學，1887 年畢業，前述之麥信堅即為本屆畢業生。第三屆學生 12 名，全為香港中央書院(Hong Kong Central School)畢業生。¹¹⁰

第二、三屆學生來自香港，究竟因天津當地學生來源缺乏，或者因設想香港學生外文能力較優，方便洋醫官授課，不得而知。從西方媒體盛讚麥信堅「英語異常流利、準確」、「學識淵博、醫術超群」，¹¹¹ 應可推想「附屬醫學館」的醫學教育具有相當水準。

總督醫院附屬醫學館的經費來自直隸省防軍費用，因此可稱為「中國近代第一所官辦的西醫學校」；¹¹² 如果由畢業學生分派擔任軍醫的出路來看，「總督醫院附屬醫學館」也可以稱為近代中國第一所軍醫學校。馬根濟去世

¹⁰⁶ 晚清中國第一所正式的西醫學校是 1866 年附設在廣州博濟醫院內的「博濟醫校」。K. Chimin Wong and Wu Lien-the,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1936, 上海, 上海辭書出版社重印, 2009 年 4 月), p.391; 另見何小蓮, 〈西醫東傳: 晚清醫療制度變革的人文意義〉, 《史林》(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2002 年第 4 期, 頁 71。博濟醫校由嘉約翰(John Kerr)主持, 1912 年停辦, 畢業生共 150 人。

¹⁰⁷ 《天津簡史》, 頁 165。

¹⁰⁸ 張俠等合編, 《清末海軍史料》, (上)(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82 年 5 月), 頁 449。

¹⁰⁹ 〈肄習西學請獎摺〉(光緒 11 年 3 月 3 日), 《李鴻章全集》, 第 11 冊, 《奏議》卷 11, 頁 54-55。

¹¹⁰ Knight Biggerstaff, p.69。第三屆學生入學與畢業時間未詳。

¹¹¹ 同註 59。

¹¹² Mrs. Bryson 稱此館為 “the first Government medical school in China”, 參見 Mrs. Bryson, op. cit., p.231。另參見 Knight Biggerstaff, op. cit., p.69。

後，李鴻章在天津地方商人們的捐助下，另外成立一所官立醫院，附屬醫學館也就併入該醫院。¹¹³ 附屬醫學館的存在時間雖然不長，並且有濃厚的李鴻章個人辦學的色彩，但是它為近代中國培育早期的一批醫學教育與軍醫人才，在近代中國的醫學教育史與軍醫史上具有承先啓後的重要意義。

(2) 創設北洋西醫學堂

馬根濟去世後，有幾年的時間，李鴻章與西方醫學教育的關係目前未詳。

1888年8月7日的上海《申報》，為此時李鴻章獲得西醫醫生的來源提供一些蛛絲馬跡，報導謂，西醫梅威令(William Wykeham Myers，買威令、梅耳斯、梅爾)先生教授醫法於華學生，「三人業已成功，日前試演軍營救療兵士之法，並請在滬各醫生公同評隲給予憑據，俾得行道關。……聞不日梅君即當挈之北上交與李傅相，因傅相前曾有言謂此次學生學成之後，當量為保獎請給以功名，並欲令此學生等分往各軍再行教授，以便薪傳授受，愈推愈廣，傅相之用心可謂周至矣。」¹¹⁴ 三人名為李基芬、陳呈榮、吳傑模，皆被發給行醫之憑據；另一名林璣璋者，在醫院中襄事已有九年之久，因西文不甚精熟，未獲行醫之憑據，但熟悉辦理醫院中諸事，所以發給辦理醫院事務之憑據。該報導並謂梅威令，「自聞傅相言將來學生等學成之後，擬分置各軍，於是知中國之所以習西醫者所重在此，乃復教以行軍時救治受傷兵士之法，並一切應用器具重新添置，俾得以盡其長，自今日而業已有成。」¹¹⁵ 依據這則報導，可以看出，一、李鴻章經由在滬西醫代為訓練學生，考校合格，再由其保獎，並令這些學生分往各軍成為種子醫官。二、四人當中，三人合格得行醫之憑據，一人獲辦理醫院事務之憑據。三、為配合李鴻章需求與學生實用需要，在滬西醫特別授以救治受傷兵士之法。

¹¹³ Knight Biggerstaff, op. cit., p. 69。

¹¹⁴ 〈書本報領憑誌盛事後〉，《申報》，1888年8月7日(光緒14年6月30日)。梅威令1879年曾任旗後醫館醫師，並募款建慕德醫院(David Manson Memorial Hospital)，在院內首推動臺灣醫學教育，見蘇芳玉，前引文，頁140。

¹¹⁵ 同前註。

又如 1887 年香港西醫書院第一屆入學的 12 人中，到 1892 年畢業時僅剩孫中山、江英華兩人。¹¹⁶ 兩人畢業後曾由香港總督羅便臣(William Robinson, 1891.12-1898.2，任第 11 任港督)馳書北京英公使，託英公使轉商於李鴻章給予位置，李復書羅便臣總督謂兩人可來京候缺，每人暫給月俸 50 元。兩人後因抗議粵督給照手續繁瑣，未成行。¹¹⁷ 由此一例，也說明李鴻章的醫學畢業生推薦人脈遠及於香港。

1888 年(光緒 14 年)總理海軍衙門奏定《北洋海軍章程》，內有「旅順口、威海衛水師養病院並天津儲藥施醫總醫院事，由提督與水師營務處、津海關道會商派員管理」條文。¹¹⁸ 《北洋海軍章程》為李鴻章幕僚周馥所擬，自然反映李鴻章的想法與理念。¹¹⁹ 1889 年(光緒 15 年)北洋海軍在威海衛和旅順首先開辦兩座水師醫院，1893 年 12 月 8 日(光緒 19 年 11 月初 1 日)天津儲藥施醫總醫院(即天津總醫院)開院試辦，附設西醫學堂亦籌備成立。天津總醫院聘請英國天津稅務署醫官歐士敦為顧問，「海軍各營艦及各砲臺、防營、弁兵內外各症，隨時診治有效，遇有四方貧民求診，亦酌給方藥」。¹²⁰ 天津總醫院下「分西醫學堂、施醫院、儲藥處三大端，專司購儲材料、診治弁兵，並挑選生徒分班肄習，俾學成後派赴海軍各營艦充當醫官，尤為北洋各醫院之根本」。¹²¹ 天津總醫院內附設的西醫學堂即後來所稱的「北洋西醫學堂」，也常被稱為「北洋醫學堂」、「北洋海軍醫學堂」或「天津醫學堂」，這是近代中國第一所正式的官辦西醫學堂，也是第一所正式的官辦軍醫學堂。

依畢乃德說法，附屬醫學館為北洋西醫學堂前身，然而有關附屬醫學館

¹¹⁶ 余繩武、劉存寬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 8 月)，頁 313、頁 314。

¹¹⁷ 鄭子瑜，〈總理老同學江英華醫師訪問記〉，《華僑日報》，民國 29 年 1 月 26 日，轉引自李敖，〈孫逸仙和中國西化醫學〉，收《李敖大全集》(臺北，榮泉文化公司，1999 年 5 月 12 日)，第 5 冊，頁 95-96。

¹¹⁸ 茅海建主編，《清代兵事典籍檔冊匯覽》，第 92 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年 8 月)，頁 459。

¹¹⁹ 戚其章《晚清海軍興衰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 4 月)，頁 318-320。

¹²⁰ 〈醫院創立學堂摺〉(光緒 20 年 5 月 23 日)，《李鴻章全集》，第 15 冊，《奏議》，卷 15，頁 365。

¹²¹ 同前註。

在 1888 年至 1893 年的運作細節，目前無法得知。因此，北洋西醫學堂與總督醫院附屬醫學館是否有直接關係，並無直接史料可以證明，但是它們均由李鴻章所創辦與支持，這點是肯定的。

北洋西醫學堂於 1894 年 12 月 25 日正式開學，亦委派歐士敦為醫學監督，前任廣東籍的英國愛丁堡大學醫學士曲桂庭為第一任總辦(校長)，後由總督醫院附屬醫學館第一屆畢業生林聯輝繼任總辦一職。最初學生只收廣東一省，後經天津地方人士抗議，才改招部分津籍學生。¹²² 雖然此時李鴻章已因甲午戰爭失敗下臺，但北洋西醫學堂的創辦，明顯是以李鴻章對軍醫制度的認識為指導理念。李鴻章在稍早的〈醫院創立學堂摺〉中清楚說明他的想法，他指出「西洋各國行軍以醫官為最要，而救治傷科，直起沈痼，西醫尤獨擅專長。其學以考求經絡、辨別藥性為始基；以察臟腑之運行，練臨症之理法為進步。其究以洞內科之精，徵平諸家之同異為極功，非專門名家，歷經考試，該國家未能給憑診治。北洋創辦海軍之初，雇募洋醫，分派各艦，為費不貲，是興建西醫學堂，造就人才，實為當務之急」。¹²³ 可見「北洋西醫學堂」以培養海軍軍醫為宗旨，是道地的軍醫學堂。

依據李鴻章幕僚所擬訂的「北洋西醫學堂學規」，學堂學生以二十名為額，分為第一、第二兩班，第一班學生十名，擬於上海、香港洋文學堂挑選已通英國語言文字者，俾四年之間可至考取醫官之藝。第二班學生十名，擬於天津紫竹林丁家立中西書院及武備幼學堂挑選。¹²⁴ 北洋西醫學堂的學規分成四類：甄別學生之規、學堂功課之規、日行之規和考試之規。以「學堂功課之規」最為切要，其要點為 (a) 學生堂課固宜講求，而臨症尤最為切要，

¹²² 葉續源，〈國防醫學院前史——從張建教育長與軍醫學校的關係溯源〉(上)，《源遠季刊》，第 19 期(國防醫學院校友會，2006 年 11 月 12 日出版)，<http://www.ndmc.org.tw/ndmcz/19/19-p06-09.pdf>；郭振華、范永祥，〈北洋海軍醫學院滄桑〉，《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 48 輯，1989 年 8 月，頁 161。

¹²³ 〈醫院創立學堂摺〉(光緒 20 年 5 月 23 日)，《李鴻章全集》，第 15 冊，《奏議》，卷 15，頁 365。

¹²⁴ 〈北洋西醫學堂學規〉，《萬國公報》，1894 年 2 月，頁 15a (總頁 14205)。丁家立中西書院為美籍傳教士丁家立 (Tenney Charles Daniel, 1857-1930) 於 1886 年所創。

學習半年後，於醫學門徑略能領會，每至施醫之時，按日輪班，隨同醫官就近往醫院診視，以廣學識。(b) 學生四年屆滿，得有執照，准以醫學謀生，方許為人診治，如在年限未滿，或已滿而醫學未精未得執照者，除按日輪班隨醫官在醫院臨症，准為人診治外，否則不得自作聰明，亂施刀圭，或有錯誤以昭慎重。¹²⁵ 此二者即今日醫師訓練採用見習、實習、跟診、國家考試等之嚆矢。

北洋西醫學堂學規的實際執行情形，未見相關記載，但這是近代中國的醫學教育訓練與醫學生管理的早期張本。

威海衛水師醫院、旅順水師醫院，加上天津總醫院，再加上北洋醫學堂，可說是當時中國最大的醫療機構。出身傳教士的美國駐華外交人員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 1844-1912, 1869 來華。)對此一醫療部門帶來的商機，有如下的觀察，「常年有許多買賣的代理人，川流不息地從各地區和海洋上的各島嶼走向天津的總督衙門。其中有出賣槍砲的人，……有出賣……藥品、外科器具、膏藥、裹傷紗布、繃帶、病院設備的人，這些人都如急流般地奔向天津去。」¹²⁶ 可以想見此時天津一地醫藥器材交易的熱絡，也說明西方醫學已在近代中國已漸形成一股銳不可當的潮流。

(3) 引進北洋海軍軍醫制度

李鴻章的眼光會注意到海軍的軍醫制度來，可能多少是受西方人士的牽引，除前述幕府中的外國醫師們的影響外，曾覬覦大清國海軍最高領導權的洋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似也有意在中國推動此事。赫德於1881年12月12日從北京寫給在倫敦的金登幹(James D. Campbell, 1833-1907)的信裡，就鮑德鈞留在大清巡洋艦上工作一事，寫下「我希望，我們現在可

¹²⁵ 〈續北洋西醫學堂學規〉，《萬國公報》，1894年3月，頁16b-17b(總頁14274-14276)。

¹²⁶ 何天爵撰，張雁深摘譯，〈中國的海陸軍〉(譯自 Chester Holcombe, “The Chinese Army and Navy” in *Real Chinese Question*, London, 1901)，中國史學會主編，《洋務運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再版)，第8冊，頁468。

以讓中國懂得，外科醫生對戰艦來說是必不可少的」的想法。¹²⁷

依據《北洋海軍章程》，海軍軍醫的員額、編制、預算都有明確的規定。譬如其中「船上差缺」部分，規定北洋海軍醫官分總醫官、一等醫官、二等醫官、三等醫官四級，員額為總醫官、一等醫官各 1 員，二等醫官 2 員，三等醫官 18 員，共 22 名。¹²⁸ 在「船上差缺糧餉」部分，規定總醫官月支銀 60 兩，一等醫官月支銀 36 兩，二等醫官月支銀 24 兩，三等醫官月支銀 20 兩。¹²⁹ 醫官之外，與醫療相關的人員還有醫士、病房司事、配藥從人等編制。

在李鴻章等人的推動之下，北洋海軍所屬的北洋艦隊開始配置軍醫，這是海軍史上的創舉。將北洋艦隊的軍醫編制，列如下表：

表 2：北洋艦隊軍醫編制

軍 艦	員 額	軍 醫	備 註
鎮遠，鋼面鐵甲	用人 329 員名	二等醫官一員 管病房司事一名	
定遠，鋼面鐵甲			
致遠，鋼板快船	用人 202 員名	三等醫官一員	
濟遠，快船穹面鐵甲			
靖遠，鋼板快船			
經遠，鋼板快船			
來遠，鋼板快船			
超勇快船，木身外包鋼板	用人 137 員名	三等醫官一員	
揚威快船，木身外包鋼板			
鎮中蚊礮船，木身外包鋼板	用人 55 員名	三等醫官一員	與鎮邊礮船共設一員

¹²⁷ 苑書義，《李鴻章傳》，頁 263-264；《中國海關密檔》（1874-1907），第 2 卷（1878-1881），頁 674-675。赫德 1854 年來華，至 1908 年返英，共在華 54 年。

¹²⁸ 《北洋海軍章程》，第 2 冊，《清代兵事典籍檔冊匯覽》，第 92 冊，頁 21（總頁 305-306）。

¹²⁹ 《北洋海軍章程》，第 4 冊，《清代兵事典籍檔冊匯覽》，第 92 冊，頁 9（總頁 379-380）。

李鴻章與近代西方醫學在中國的傳佈

軍 艦	員 額	軍 醫	備 註
鎮邊蚊礮船，木身外包鋼板	用人 54 員名		
鎮東蚊礮船，木身外包鋼板	用人 55 員名	三等醫官一員	與鎮西礮船共設一員
鎮西蚊礮船，木身外包鋼板	用人 54 員名		
鎮北蚊礮船，木身外包鋼板	用人 55 員名	三等醫官一員	與鎮北礮船共設一員
鎮南蚊礮船，木身外包鋼板	用人 54 員名		
威遠練船，檣木身鐵脅	用人 124 員名	三等醫官一員	
威遠練船，檣木身鐵脅	用人 124 員名	三等醫官一員	
敏捷夾板練船	人 60 員名	三等醫官一員	
練勇學堂	用人 14 員名又礮目練勇 270	三等醫官一員	
利運運船，船身鐵質	用人 57 員名	三等醫官一員	
魚雷艇六艘	用人各 28、29 員名	無配置醫官	

資料來源：茅海建主編，《清代兵事典籍檔冊匯覽》，頁 151-262。

根據上表，北洋艦隊的官兵員額約共 3,000 人，而軍醫編制名額，包括訓練部門有醫官 18 人，加上管病房司事 2 名，共有醫療人員 20 人，平均 1 醫療人員要照顧 150 人官兵，負擔不輕。醫療人員的總人數編制不多，但已難能可貴。其中蚊礮船(gunboat)為兩艘共用一員醫官，魚雷艇則無醫官編制。

北洋海軍採取西方軍醫制度後，可以在一些零星資料中，發現與西方醫療相關的醫療行政、醫藥治療與人事開銷等記錄，列如下表：

表 3：北洋海軍醫療經費支出一覽表

項 目	金 額	資 料 來 源	備 註
定、鎮、濟三艦並快練蚊礮各船及屯船共 14 隻，歲支醫藥費。	銀 2,250 兩(每月攤算，應月支銀 187 兩 5 錢。)	〈致醇邸覆陳海軍規模籌辦船塢〉(光緒 11 年 11 月 29 日)，《李鴻章全集》，第 33 冊，《信函》，卷 5，頁 595。	
定遠、鎮遠兩艦各配設官弁匠役 331 員名	歲支醫藥費銀各 300 兩	〈酌定鐵甲船人數餉數摺〉(光緒 12 年 2 月 9 日)，《李鴻章全集》，第 11 冊，《奏議》，卷 11，頁 341。	
濟遠艦配設官弁匠役 204 員名	歲支醫藥費銀 200 兩	同上	
煙臺水師養病公所經費	銀 680 兩 8 錢 5 分 3 釐 6 毫 6 絲。	〈海防經費報銷摺〉(附清單)(光緒 13 年 11 月 26 日)，《李鴻章全集》，第 12 冊，《奏議》，卷 12，頁 267。	北洋海防經費自光緒 9 年正月起到 10 年 12 月底止收支款目
購外國醫治槍傷藥物、器具	銀 144 兩 9 錢 3 分 3 釐 6 毫	同上，頁 275。	同上
購醫治傷病外國藥物、器具	1,929 兩 9 錢 4 分 3 厘 5 絲	同上	同上
水師屯船添派醫士一名	月支薪水銀 18 兩	〈海防用款立案摺〉(附清單)(光緒 14 年 8 月 20 日)，《李鴻章全集》，第 12 冊，《奏議》，卷 12，頁 463。	光緒 11 年正月起到 12 月底止動用北洋海防經費
水師官醫生曹茂祥、何廷樑、周傳謬三名。	共月支薪工銀 90 兩	同上	
洋員漢納根經造旅順水陸弁兵醫院及教習住房共 31 間，并購備醫治傷病外國藥料器具工料	銀 4,166 兩 1 錢零。	同上，頁 466。	

項 目	金 額	資 料 來 源	備 註
旅順、威海兩處水陸各軍養病院歲需醫藥經費	銀 4,000 兩	《北洋海軍章程》，第 4 冊，《清代兵事典籍檔冊匯覽》，第 92 冊，頁 25(總頁 411)。	遇有戰事，如經費實有不敷，准核實開報加增。
敏捷水師練船(敏捷夾板練船)歲支醫藥費	銀 200 兩	〈置買帆船片〉(光緒 14 年 11 月 27 日)，《李鴻章全集》，第 12 冊，《奏議》，卷 12，頁 524。	光緒 14 年 9 月 1 日起在北洋經費內開支
(「操江」輪船)醫士一名	月支薪水銀 18 兩	〈海防用款立案摺〉(光緒 14 年 12 月 10 日)，《李鴻章全集》，第 12 冊，《奏議》，卷 12，頁 532。	
水師官醫生曹茂祥等薪工	銀 1,829 兩	〈海防收支清冊摺〉(附清單)(光緒 15 年 1 月 21 日)，《李鴻章全集》，第 13 冊，《奏議》，卷 13，頁 17。	
旅順、威海水師醫院	月支銀 310 兩。	〈分別撤留各局摺〉(附清單)(光緒 16 年 3 月 21 日)，《李鴻章全集》，第 13 冊，《奏議》，卷 13，頁 341。	

依據上表，實際艦艇人員與編制略有出入；由報銷經費分析，可知部分為固定預算，部分為臨時經費；其次，可了解當時艦上醫官月薪銀 30 兩，醫士月薪銀 18 兩，應有服勤加給。這些醫療開銷與購買西方船艦炮彈時動輒數百萬兩的經費相比，是「九牛一毛」，但已是北洋海軍現代化的重要指標，具有時代意義。

4. 李鴻章對西方醫學傳入中國的影響

李鴻章自己重視西方醫學、贊助西方醫，同時他也常將個人的西式醫療與養生經驗推薦給身旁的人，這些人有長官、同僚、部屬、幕友等，西方醫學在晚清官場間，無形中得以普及。在他的率先提倡下，設立西醫學堂或成立軍醫學堂，也儼然成為晚清中央與各省的共識。

(1) 對其他官員的影響

在李鴻章的電報與信函中，有不少他與其他官員針對西方醫學、西式養生交換訊息的有關資料。例如李鴻章的上司醇親王，與李鴻章私交匪淺。在醇親王病逝前一、二年，李鴻章經由推薦西方醫學的治療方式，與醇親王頗多電報上的互動往返。1889年(光緒15年)醇親王發病，他電告李鴻章「麥生電治有效，病久難速愈耳。」¹³⁰ 醇親王會選用電療法，與李鴻章引介有關，因前已述及1888年、1889年時李鴻章曾以此法治病。李鴻章在回電中，又進一步推薦補筋藥水，並且聲稱是麥信堅的老師埃爾文的建議，而自己服這種藥水已一年。¹³¹ 到了次年，醇親王病情未好轉，李鴻章在回電醇親王時表示憂心，並說他「連日詳詢西醫，參酌脈案，似由血虛所致，能否令太醫略加補血之品或更見功。」¹³² 甚至李鴻章打算請埃爾文直接進京為醇親王看診，電報說，「英醫伊爾文在敝署診治年久，應手奏效。與言胃口不開，大便秘結之症，渠願親往看視緣由，不用峻劑，必能設法調和，若蒙准行，即令星夜赴京，借住汝家，就近常往候診，此則較中醫實有把握。」¹³³ 李鴻章對醇親王的關懷之情可以想見。

1891年李鴻章寫信給李經方時，提醒李經方看到與他交好二十年的榮祿(仲華，1834(1836)-1903)時，要「問伊腳氣好否，洋醫有效否」，¹³⁴ 在其他信函中，可以看到孫家鼐(燮臣，1827(1828)-1909)向他函索牛肉精，他寄去二盒。¹³⁵ 同時期，張蔭桓(樵野，1837-1900)向他函索消食牛肚餅，他寄去一

¹³⁰ 〈醇邸來電〉(光緒15年8月23日戌刻到)，《李鴻章全集》，第22冊，《電報》，卷2，頁531。
麥生即華籍西醫麥信堅。

¹³¹ 〈覆醇邸〉(光緒15年8月24日巳刻)，《李鴻章全集》，第22冊，《電報》，卷2，頁531。

¹³² 〈覆醇邸〉(光緒16年7月18日午刻)，《李鴻章全集》，第23冊，《電報》，卷3，頁88。

¹³³ 〈京局速送醇邸交麥信堅等〉(光緒16年10月11日巳刻)，《李鴻章全集》，第23冊，《電報》，卷3，頁123。1891年1月1日醇親王去世，享年51歲。

¹³⁴ 〈致李經方〉(光緒16年3月10日巳刻)，《李鴻章全集》，第35冊，《信函》，卷7，頁43。
榮仲華《李鴻章全集》誤為葉仲華。

¹³⁵ 〈致李經方〉(光緒16年4月18日辰刻)，《李鴻章全集》，第35冊，《信函》，卷7，頁63。

盒，內有六瓶。¹³⁶ 李鴻章似乎成爲王公貴人的醫療兼養生顧問，而藉西方醫學的推己及人，以維繫人際關係，似乎已成爲李鴻章社交活動的方式之一。¹³⁷

(2) 對淮系人物的影響

淮系指的是以李鴻章爲核心的一批將領、官員和幕僚。¹³⁸ 以下分從淮軍將領與幕府人員兩方面說明。

(a) 淮軍將領

淮軍將領從與太平軍作戰時期，已和李鴻章成爲「生命共同體」，對於這些同甘共苦、出身軍旅的淮軍將領，李鴻章時常以西方醫學的治療經驗，關心他們、安慰他們。而李鴻章在淮軍將領間引介西方醫學，也造成很好的帶頭示範作用。例如防守津、沽一帶的周盛傳(1833-1885)，曾於 1879 年(光緒 5 年 8 月)患痢疾月餘之久，自云「詣紫竹林西醫馬根濟診視，既愈，因相與縱談耶穌教」，¹³⁹ 此事也開啓他對西方醫學的好奇與關注。周盛傳曾和一知曉西醫的朋友郭鏡潭去拜訪馬根濟，他記其事，謂：「一日與郭至養病院，西醫馬根濟自外洋購來人形一具，係用紙質製成人之全體。外則五官百骸，內則五臟六腑，無不畢具，合之則成一人形，分之則內外筋絡骨節皆可拆視。先一日傳相來看，次日余與郭亦至焉。洋人將所作紙人一一剖開，指與余視，郭乃悉指出其名目功用，與洋人印證無不符合，洋人大爲驚歎，謂郭於西醫之理實有講求，非空談之比，並云傳相到時，如有郭君同行，一一指點，傳相必更恍然矣。余聞郭論亦深佩服。」¹⁴⁰ 傳相即李鴻章，周盛傳應是上了一堂人體解剖入門課。周盛傳後來在安徽合肥老家建敬節堂、義塾、育嬰堂，

¹³⁶ 〈致李經方〉(光緒 16 年 5 月 3 日)，《李鴻章全集》，第 35 冊，《信函》，卷 7，頁 70。消食牛肚餅不知爲何物。

¹³⁷ 楊明哲，〈李鴻章對西方文化的認識〉，頁 214。

¹³⁸ 馬昌華，〈淮系人物列傳——文職·北洋海軍·洋員〉，「前言」，頁 3-4。

¹³⁹ 周家駒，〈周武壯公(盛傳)遺書〉，別集一，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39，頁 25b(總頁 1222)。

¹⁴⁰ 同前註，頁 26b-27a(總頁 1224-1225)。

並置牛痘局，「延請醫生善種牛痘，以濟疾厄」，可算是以西方醫學造福桑梓。¹⁴¹

淮軍另一將領劉銘傳(省三, 1836-1896.1.12)在 1880 年(光緒 6 年)便曾就洋醫調治眼疾。¹⁴² 十年後, 1890 年, 劉銘傳又為病所困, 李鴻章還提醒他, 「須請老練洋醫診視, 勿亂喫藥為要」。¹⁴³ 劉銘傳來臺後, 四次請辭, 其中因素之一即為久病, 而臺無良醫可治病。¹⁴⁴ 劉銘傳後來在臺北成立官醫局, 招聘西人醫師, 嘉惠在臺軍民。¹⁴⁵ 1888 年底的《申報》曾報導有關此一官醫局的消息, 謂該局除看病取藥不取分文外, 如果留局養病, 每人日發給錢百文, 以資食用。劉銘傳因恐營勇大半皆食洋烟, 如果拿到錢後, 「盡作呼吸之用, 每日三餐反甘忍餓。」於是想改為「每日以百文改作稀飯, 由局按時供給」。總辦富南軒則打算加以修正為「稀飯照供外, 夜間燈油以及煮藥炭火亦由本局供給, 約計尚餘三十文左右, 再按名發給本人, 俾作零用之費」,¹⁴⁶ 可見此一官醫局確有運作。

(b) 幕府人員

李鴻章的幕僚中, 跟隨他最久的當屬周馥(1837-1921)。¹⁴⁷ 1878 年(光緒 4 年)周馥因家人為庸醫所誤致死, 他非常感慨, 「痛鄉無良醫, 誤死者多, 屢刊方示人, 無濟於事, 欲為永久醫院施藥, 恨力不繼, 他日子孫為我償此願, 勝於誦經念識、超度先人萬萬矣」,¹⁴⁸ 可見他此時已有引用西醫的念頭。1902 年周馥任山東巡撫時, 因病, 由德國膠澳總督派德人醫生顧實(Gouch)

¹⁴¹ 同前註, 卷 9, 頁 6b-7a (總頁 820-821)。

¹⁴² 〈劉銘傳力疾赴京片〉, (光緒 6 年 10 月 24 日), 《李鴻章全集》, 第 9 冊, 《奏議》, 卷 9, 頁 225。

¹⁴³ 〈覆臺撫劉〉(光緒 16 年 3 月 4 日午刻), 《李鴻章全集》, 第 23 冊, 《電報》, 卷 3, 頁 38。

¹⁴⁴ 黃秀政、黃文德, 〈首任臺灣巡撫劉銘傳去職研究〉, 收錄於黃秀政等著, 《臺灣史志論叢》(臺北, 五南圖書公司, 民國 88 年 6 月), 頁 132-133。

¹⁴⁵ 連橫, 《臺灣通史》(臺北,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民國 70 年 10 月 5 版), 卷 21, 「鄉治志」, 頁 438。

¹⁴⁶ 〈醫局改章〉, 《申報》, 1888 年 12 月 30 日 (光緒 14 年 11 月 28 日)。

¹⁴⁷ 歐陽躍峰, 《人才薈萃: 李鴻章幕府》, 頁 65。

¹⁴⁸ 周馥著, 《秋浦周尚書(玉山)全集》, 《年譜》, 卷上, 沈雲龍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 文海出版社), 第 9 輯, 頁 17a (總頁 5679)。

診病。周馥病愈後，挽留顧實在濟南開設德華醫院(Deutsches Hospital)，資金由周馥捐贈，德華銀行(Deutsch-Asiatische Bank)亦多所補助。¹⁴⁹至此，周馥得以遂其舊志。

在李鴻章的幕僚中，以吳汝綸(1840-1903)最為推崇西方醫學及西式養生方法，他這一特點已被史學界加以探討。¹⁵⁰學者指出，至遲在 1891 年(光緒 17 年)，即吳汝綸 52 歲時，他已徹底摒棄中醫而轉歸西醫。¹⁵¹吳汝綸認為，「醫學，西人精絕，讀過西書，乃知吾國醫家，殆自古妄說」。¹⁵²他也為朋好「至今仍多堅信中國含混醫術，安其所習，毀所不見，寧為中醫所誤，不肯一試西醫，殊為悼嘆」。¹⁵³其次，吳汝綸也是牛肉精的崇拜者與愛用者。他在信中告訴友人，「牛肉精并非藥物，即牛肉之精華也。緣天下至養人之物，無過牛肉」。¹⁵⁴他也建議友人，「尊公之病，但服牛肉精四五十日，必當霍然，不知舊疾之何往」；並謂「近時貴人，如李傅相、恭醇二邸，皆以此物為至寶，竊而在下，與某游者，平日或講理學，或講文章，無不遵服此藥，以其真有奇效也」。¹⁵⁵在面對西方醫學態度的光譜上，吳汝綸應該是在「崇拜」的極右端。

袁世凱(1859-1916)也是出身淮系幕僚人員，1902 年(光緒 28 年)袁世凱擔任直隸總督時，在天津創辦北洋女醫院，¹⁵⁶同時袁世凱也將天津「變成一個為全國生成多樣化的衛生現代性模式的中心」。¹⁵⁷其他譬如 1875 年入李鴻

¹⁴⁹ 山口昇，《歐米人の支那に於ける文化事業》，頁 1239。

¹⁵⁰ 參見董叢林，〈吳汝綸醫藥觀的文化表現及成因簡論〉，《安徽史學》(合肥，安徽省社會科學院)，2005 年第 4 期；汪維真，〈棄中擇西：清人吳汝綸醫學觀的轉變及原因分析〉，《安徽史學》，2006 年第 2 期。

¹⁵¹ 汪維真，〈棄中擇西：清人吳汝綸醫學觀的轉變及原因分析〉，頁 72。

¹⁵² 〈答何豹丞〉(丁酉(1897 年)11 月 17 日)，《吳汝綸尺牘》，頁 112。

¹⁵³ 〈答蕭敬甫〉(辛卯(1891 年)6 月晦(30)日)，《吳汝綸尺牘》，頁 36。

¹⁵⁴ 〈與王小泉〉(癸巳(1893 年)5 月 11 日)，《吳汝綸尺牘》，頁 49。

¹⁵⁵ 〈與王西渠〉(癸巳(1893 年)4 月 25 日)，《吳汝綸尺牘》，頁 47。恭醇二邸即恭親王、醇親王。

¹⁵⁶ 天津市地方志編修委員會編著，《天津通志》，頁 342。1916 年北洋女醫院改名為天津女醫院。

¹⁵⁷ 羅芙芸(Ruth Rogaski)著，向磊譯，前引書，頁 201-204。

章幕的薛福成(1838-1894)，¹⁵⁸ 他在 1890 年奉派出使西歐英、法、義、比四國。在歐洲期間，薛福成考察西人醫院，並曾派隨員醫官趙元益(1840-1902)及翻譯學生王豐鎬(1859-1910 在世)同赴德國細菌學家科赫(Robert Koch, 1843-1910)的實驗室考察，以學習其治療癆症之法。¹⁵⁹ 又如曾被李鴻章委派為上海機器織布局總辦、上海電報局總辦、輪船招商局總辦的鄭觀應(1842-1922)，¹⁶⁰ 為文申論何謂「醫道」，他雖然說「中西醫學各有短長」，但也指出中醫有五個方面不如西醫，例如考校之法、解剖之法、徵實之法、治病之法、診病之法等。¹⁶¹

從這些淮系人物對西方醫學的關注與偏好，充分反映李鴻章本身對西方醫學的態度所造成的「燈塔效應」，在李鴻章與淮系人物們持續地提倡與支持下，西方醫學在晚清時期能有進一步的傳佈。至清末新政時期，清政府開始重視本國的醫療衛生事業，而各地的大小官員遇有新醫院、新醫學校建成或醫學校學生畢業時，不僅給予贊助，甚且親往參加以表支持。¹⁶² 公開表態支持西方醫學，已成為官場上習以為常的風氣，這是西方醫學在晚清已漸普及的證明。

(3) 軍醫制度的普及

甲午戰爭之後，創辦醫學堂，培養醫技人才，成為西藝教育思潮主流之一，中央與地方各省先後提倡西醫教育，例如先後主管京師大學堂的孫家鼐與張百熙(1847-1907)均重視西方醫學教育；¹⁶³ 又如先後擔任湖廣總督的張之

¹⁵⁸ 馬昌華，《淮系人物列傳——文職·北洋海軍·洋員》，頁 147。

¹⁵⁹ 薛福成，《出使四國日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年 1 月)，頁 224。趙元益字靜涵，後為上海名醫；王豐鎬字省三，後任浙江交涉史。

¹⁶⁰ 馬昌華，《淮系人物列傳——文職·北洋海軍·洋員》，頁 165。

¹⁶¹ 鄭觀應，〈醫道〉，《鄭觀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520-523。

¹⁶² 李傳斌，〈晚清政府對待教會醫療事業的態度和政策〉《史學月刊》(開封，河南大學)，2002 年第 10 期，頁 44。

¹⁶³ 翟立鶴，《清末教育西潮——中國教育現代化之萌芽》，頁 492-494。

洞(1837-1909)與陳夔龍(1857-1948)，施政都規劃有醫學堂，發展西醫教育。¹⁶⁴

由李鴻章首先倡導的軍醫教育，在晚清末期也有長足的發展。原本專司培養北洋海軍軍醫的「北洋西醫學堂」，甲午戰爭後，改稱「北洋醫學校」，1915年10月由民國海軍部接收，改稱「天津海軍軍醫學校」，首任校長經亨咸(1874-1929 在世)為「總督醫院附屬醫學館」第四屆畢業生。¹⁶⁵此時，各地先後創辦軍醫學堂，培養軍醫人才。列如下表：

表 4：清末各省軍醫學堂建置表

名 稱	堂 址	創設時間	創設人	備 註
北洋(天津)軍醫學堂	天 津	1902 年 (光緒 28 年)	袁世凱	原則上採取三年半制，學生 40 名，1906 年陸軍部軍醫司接管，更名為陸軍軍醫學堂，1918 年遷北京。
四川軍醫學堂	成 都	1904 年 (光緒 30 年)	錫 良	聘法人羅尙德任總教習，學生 30 名，每軍營選派一名。
保定軍醫學堂	保 定	1905 年 (光緒 31 年)	袁世凱	奏定招滿漢學生 140 名，後遷天津，併入北洋軍醫學堂。
廣東隨營軍醫學堂	廣 州	1905 年 (光緒 31 年)	岑春煊	1907 年更名為廣東軍醫學堂
湖北軍醫學堂	武 昌	1905 年 (光緒 31 年)	張之洞	
江蘇衛生學堂	江 寧	1906 年 (光緒 32 年)	端 方	附設獸醫學堂，兼請求蹄鐵之術，學額均為 60 名，聘有日本教習。

資料來源：1. 王吉民，〈中國新醫事物紀始〉，《中華醫學雜誌》，第 31 卷第 5、6 期合刊，1945 年，頁 284。

2. 郭鳳明，《清末民初陸軍學校教育》(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民 67 年 8 月)，頁 114，「清末軍醫學堂建置表」。

3. 袁世凱，〈籌設北洋軍醫馬醫經理軍械各學堂摺〉，《養壽園奏議輯要》，卷 28，轉引自《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一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9 年 12 月)，頁 82。

¹⁶⁴ 蘇雲峯，《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35)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 65 年 5 月)，頁 162、頁 215-217。

¹⁶⁵ 參見包遵彭，《中國海軍史》(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民 59 年 5 月)，頁 829。畢業生資料見《清末海軍史料》，(上)，頁 449-451。天津海軍軍醫學校 1930 年停辦，附設醫院 1933 年停辦。

4. 鄭志廷、張秋山等編，《保定陸軍學堂暨軍官學校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 71-74。

其中，袁世凱於 1902 年開辦北洋軍醫學堂時，任命 1887 年畢業於「總督醫院附屬醫學館」第二屆的徐華清(1861-1924)為總辦。¹⁶⁶「總督醫院附屬醫學館」的畢業生，分別肩負培養後起軍醫的重責大任，說明李鴻章提倡軍醫培育的遠見，也顯示他在軍醫制度上的開創地位。

5. 結 論

以往與李鴻章相關的研究，過多地集中在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本文則以李鴻章與近代西方醫學在中國的傳佈為研究方向。一如李鴻章鼓吹興建鐵路與電報般，最能被朝廷和守舊派大臣們接受的理由，當然是強調這些新科技與新興事業在抵抗外患上的有效性與重要性。¹⁶⁷ 李鴻章身為封疆大吏，又是淮軍與北洋海軍實際領袖，他會將西方醫學與晚清的軍事制度相連結，也是順理成章之事。

經由本文的探討，李鴻章對西方醫學有高度興趣，李鴻章不但自己個人重視西方醫學，並影響周遭的家人、親友、其他官員、淮系人員等，而且還贊助醫院與醫學校的設立，甚至推動軍醫制度的創立。在李鴻章的提倡與影響之下，清朝部分官員也起而仿效，1901 年李鴻章辭世之後，他所提倡的西方醫學與軍醫制度，非但沒有「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反而在各地風行景從。李鴻章與西方醫學在近代中國的傳佈關係密切，西醫教育與西醫制度能在近代中國開枝散葉，李鴻章實居關鍵地位。

¹⁶⁶ 河北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保定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年 1 月)，頁 12、37。《清末海軍史料》，(上)，記徐華清為徐清華，見頁 449。北洋軍醫學堂即今臺灣的國防醫學院前身。

¹⁶⁷ 楊明哲，〈李鴻章對西方文化的認識〉，頁 199-200。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史料

- 《申報》，(上海，申報館)，上海：上海書店，1982-1987 影印再版。
- 《萬國公報》，林樂知主編，臺北：華文書局，1968 影印再版。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一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編，陳霞飛主編，《中國海關密檔——赫德、金登幹函電匯編》(1874-1907 共 8 卷)，第 2 卷(1878-1881)，北京，中華書局，1990。
- 王闓運，《湘綺樓日記》，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
- 李國杰編，《合肥李氏三世遺集》，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7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 周 馥，《秋浦周尚書(玉山)全集》，《年譜》，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9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 周家駒，《周武壯公(盛傳)遺書》，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9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
- 茅海建主編，《清代兵事典籍檔冊匯覽》，92，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 徐壽凱、施培毅校點，《吳汝綸尺牘》，合肥：黃山書社，1990。
- 張俠等合編，《清末海軍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 陳義傑整理，《翁同龢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
- 蔡爾康、林樂知編譯，張英宇點、張玄浩校，《李鴻章歷聘歐美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 劉聲木，《萇楚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下《清代史料筆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
- 鄭觀應，〈醫道〉，《鄭觀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薛福成，《出使四國日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 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顧炳權編著，《上海洋場竹枝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

中文部分——論著

王吉民 (1945)，〈中國新醫事物紀始〉，《中華醫學雜誌》，31(5)、(6)，頁 284-290。

王秀雲 (2008)，〈不就男醫：清末民初的傳道醫學中的性別身體政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9，頁 29-66。

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1987)，《天津簡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市地方志編修委員會編著 (1999)，《天津通志》，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包遵彭 (1970)，《中國海軍史》，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石霓著 (2000)，《觀念與悲劇——晚清留美幼童命運剖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合肥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 (1999)，《合肥市志》，《安徽省地方志叢書》，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安徽文化史編委會 (2000)，《安徽文化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何小蓮 (2002)，〈西醫東傳：晚清醫療制度變革的人文意義〉，《史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頁 66-75。

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著，張雁深譯，(2000)，〈中國的海陸軍〉，《洋務運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汪維真 (2006)，〈棄中擇西：清人吳汝綸醫學觀的轉變及原因分析〉，《安徽史學》，2，頁 68-74。

余繩武、劉存寬主編 (1994)，《十九世紀的香港》，北京：中華書局。

李 敖 (1999)，〈孫逸仙和中國西化醫學〉，《李敖大全集》，臺北：榮泉文化公司。

李尚仁 (2004)，〈醫學、帝國主義與現代性：專題導言〉，《臺灣社會研究季刊》，54，頁 1-16。

李書春 (1979)，《李文忠公鴻章年譜》，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

- 編》，70，臺北：文海出版社。
- 李傳斌 (2001)，〈李鴻章與近代西醫〉，《安徽史學》，3，頁 21-24。
- 李傳斌 (2002)，〈晚清政府對待教會醫療事業的態度和政策〉，《史學月刊》，10，頁 41-46。
- 河北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保定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1987)，《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 阿綺波德·立德(Alicia Little)著，王成東、劉浩譯，(1998)，《穿著藍色長袍的國度》，頁 308，北京：時事出版社。
- 苑書義 (2005)，《李鴻章傳》，北京：人民出版社。
- 郝先中 (2005)，〈晚清中國對西洋醫學的社會認同〉，《學術月刊》，5，頁 73-79。
- 馬伯英等 (1993)，《中外醫學文化交流史——中外醫學跨文化傳通》，上海：文匯出版社。
- 馬昌華主編 (1995)，《淮系人物列傳——文職·北洋海軍·洋員》，合肥：黃山書社。
- 連橫 (1981)，《臺灣通史》，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重印。
- 戚其章 (1998)，《晚清海軍興衰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 梁啟超 (1958)，《論李鴻章》，臺北：中華書局重印。
- 張社生 (2009)，《絕版李鴻章》，上海：文匯出版社。
- 張星烺 (2000)，《歐化東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
- 張維華 (1987)，〈馬大夫紀念醫院簡史〉，《天津文史資料選輯》，38，頁 150-151。
- 張禮恒 (2005)，《何啟、胡禮垣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 陳邦賢 (1936)，《中國醫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
- 陳毅華 (1991)，〈基督教在合肥〉，《合肥文史資料》，7，頁 184-188。
- 郭振華、范永祥 (1989)，〈北洋海軍醫學院滄桑〉，《天津文史資料選輯》，48，頁 161。
- 郭鳳明 (1978)，《清末民初陸軍學校教育》，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
- 黃秀政、黃文德 (1999)，〈首任臺灣巡撫劉銘傳去職研究〉，《臺灣史志論叢》，

臺北：五南圖書公司。

舒新城 (1933)，《近代中國留學史》，上海：中華書局。

傅維康 (2001)，〈李鴻章拍「X 光」〉，《醫藥文化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楊明哲 (2003)，〈李鴻章對西方文化的認識〉，《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成立四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輔仁大學歷史學系。

楊念群 (2000)，〈西醫傳教士的雙重角色在中國本土的結構性緊張〉，《楊念群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楊念群 (2006)，《再造病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雷祿慶編 (1977)，《李鴻章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董叢林 (2005)，〈吳汝綸醫藥觀的文化表現及成因簡論〉，《安徽史學》，4，頁 52-56。

葉續源 (2006)，〈國防醫學院前史——從張建教育長與軍醫學校的關係溯源〉，《源遠季刊》(網路版)，19，頁 7-9。

翟立鶴 (2002)，《清末教育西潮——中國教育現代化之萌芽》，臺北：國立編譯館。

福爾索姆(Kenneth E. Folsom)著，劉悅斌、劉蘭芝譯，(2002)，《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劉 祺 (2008)，〈馬根濟與西醫在近代天津的傳播〉，《歷史教學》，14，頁 64-68。

鄭志廷、張秋山等編 (2005)，《保定陸軍學堂暨軍官學校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

鄧紹根 (2002)，〈中國第一臺 X 光診斷機的引進〉，《中華醫史雜誌》，32(2)，頁 99-101。

歐陽躍峰 (2001)，《人才薈萃：李鴻章幕府》，《近代名人幕府叢書》，長沙市，岳麓書社。

鄭曦原編 (2003)，《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 魏外揚 (2006),《中國教會的使徒行傳：來華宣教士列傳》，臺北：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
- 羅芙芸(Ruth Rogaski)著，向磊譯，(2007)，《衛生的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衛生與疾病的含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羅香林 (1954)，《國父之大學時代》，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竇宗一編 (1979)，《李鴻章年(日)譜》，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 70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
- 蘇芳玉 (2002)，〈清末洋人在臺醫療史——以長老教會、海關為中心〉，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蘇雲峯 (1976)，《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35)，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蘇慧廉(William E. Soothill)著，關志遠、關志英、何玉譯，(2007)，《李提摩太在中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外文部分

- Beach, H. P. (1907), *Princely me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New York: Young People's Missionary Movement.
- Biggerstaff, K. (1961),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 Chimin Wong and Wu Lien-the (1936),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ng a chronicle of medical happenings in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period*,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重印，2009。
- Mrs. Bryson (1977), *John Kenneth Mackenzie: 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 London: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San Francisco.
- 山口昇 (1922)，《欧米人の支那に於ける文化事業》，上海：日本堂書店。
- 王吉民、伍連德(K. Chimin Wong and Wu Lien-the) (2009)，《中國醫史》(英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重印。

Li Hong-Zhang and Spread of Modern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

Ming-Che Yang*

Abstract

Li Hong-Zhang, one of the most famous historical figures in modern China, has been written by historians vastly. When historians discuss the spread of Western technology and culture in China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 is an important figure that cannot be overlooked, b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 Hong-Zhang and the spread of modern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 has not been researched in-depth yet. This paper aims to restore the important legacy of Li Hong-Zhang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modern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

This paper is based on a large number of Li-rela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especially the new “*Li Hongzhang Collection*”, which offers abundant resource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 between Li Hong-Zhang and the modern Western medicine. In addi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asons why Li Hong-Zhang promoted the modern Western medicine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Li himself and his family chose Western medicine boldly, and he supported the establishing of hospitals and medical schools enthusiastically. Li Hong-Zhang adopted modern Western medicine wasn’t for military reason only, but also from a broader perspective; he hoped that the modern Western medicine could be used to take care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strengthen the country.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 Li Hong-Zhang was certainly a significant representative figure.

Keywords: Li Hong-Zhang, Western Medicine, Surgeon, Anhui Fiction

*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ang Gung University, E-mail: mjiang@mail.cgu.edu.tw.